

我曾在1998年写过一个短篇,题目叫《楼下楼上》,主要写一个人在懊悔之中的挣扎,其间,这个人遇到了楼下和楼上两个不相干的人,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两人与他的内心竟有了深刻的挥之不去的连接。当时起下这个题目,只是想隐喻主人公犹豫不决的心理状态,但后来的一些年里,我感觉到它的意义远不止一个短篇的题目,它隐喻的犹豫不决,与自己的存在,与自己的写作,以及与许多的人和事,都仿佛有着难以言说的联系。在后来的一篇短文里,我曾这样写道:“有‘犹豫不决’的存在,我们心里就踏实了许多,说明我们至少没有麻木僵化,至少还在思考,至少还有矛盾交织中的希望,也就至少不会忽略‘犹豫不决’于我们的‘重要’。”

我出生和成长在一个城市与县区农村交界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既不是城市,又和县区的农村有所不同,不说生活习惯、待人处事,只说话的口音,就上上下下地游移不定。这地方,就如同一个人处在此岸与彼岸之间一样,自然地就比两岸的人多了张望,多了比较,也多了不确定和犹豫不决。而我生长的家庭,也有点类似这地方,我的父亲在城市工作,母亲则是一个每天扛锄头下地的农民。记得那时父亲和母亲成为为人处事方面的事常有争论,母亲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这是农村,不是你们城市!”在我看来,父亲是有些不切实际地在农村套用城市的方式,而母亲虽识字不多,做事全凭着感觉,但那感觉多半都是准确的。虽是这样,父亲在家庭的作用仍是不可小视,首先他每月六七十元的工资,成为我们全家生活的保障,其次他总是把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这样的电器率先带回家来,使我们家几乎与城市的进程同步。再者,由于他的存在,我家晚上总是坐满了乡亲,听广播、看电视、议论国家大事、谈论城乡趣闻,使我们家仿佛成了一个城乡交界处的交界处。这样的环境,对成全

小说和犹豫不决

□何玉茹

我后来的写作自是难得的好事,但那时的我却并不知晓,反而一心渴望着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姐姐考上大学后,这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在自己的房间里读书或者呆坐,或者召集一群女孩子谈天说地。但奇怪的是,满足之余我仍不能摆脱父母房里的诱惑,常常地,就跑到热闹的烟气腾腾的屋里坐上一会儿。很多年里,我都在自己的房间和父母的房间之间跑来跑去,独处的时候想往热闹,热闹的时候又想往独处。

而我和城市的关系,与以上的情形也有些相似,那时,户口对人的束缚还相当严重,尽管我们与城市近在咫尺,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就像今天富人和穷人的差别一样,是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我们村的一批年轻人,不甘心这样的差别,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城市去做各种各样的临时工。就如同今天的农民工一样,区别只在,今天的农民工更多地是为了赚钱,而过去的我们更多地是怀了对城市一份浪漫的想往。我自然也是那批年轻人中的一个,每天从家到城市,又从城市回到家里。那之间是一条十几里长的坑洼不平的土路,晴天里听得自行车咣咣咣咣响,雨天里须要把自行车扛在肩上。即便这样,心里还是有几分优越,因为8小时的工作时间毕竟和村人们有了区别,在太阳还老高的时候,已经下了班的我们骑了自行车从仍在劳作的村人跟前经过,那种感觉真是难以言说。

如今,那条土路早已变成了笔直宽阔

的柏油路。可那条路在我这里,仿佛从来就没有消失过,我仿佛永远地走在路上,永远地无法抵达路的一头。我知道,那条路其实已变成了一条心路,它连接的已不不仅是城市和村庄,还波及了与心有关的方方面面,比如生与死,比如善与恶,比如爱情与婚姻,比如写作与生活……但无论它波及得多么深远,我总能看到一个犹豫不决的影子,它不那么坚定,不那么明晰,却可以体味、体察在任何一头都难以体味、体察的人生滋味和真谛。

我常想,若没有那条坑洼不平的土路,若没有对“犹豫不决”的发现,还会有我今天的写作?

我是20多岁开始写作的,记得我曾在一篇散文里写到过自己十八九岁时的生活:“白天我们(指一群女孩子)在田地里受苦,晚上我们便酿造快乐驱赶我们的受苦,没有电影看的时候,我们就聚在一起重温电影或者小说,内容是次要的,只要沾点虚无之光,我们的心灵如同萤火虫一样,不由自主地就往那里去了。反正我们不肯让具体的受苦多侵占我们的生活半步,我们宁愿有更多的虚无,我们实在需要精神来支撑受苦的身躯。”

因此,我最初的写作,其实是从世俗生活中超脱出来的浪漫写作。而小说又是谈人的精神的,正需要这超脱的精神状态。待写作深入下来,我才开始意识到,写作其实远不止是一片浪漫的云彩,它也许是一种超脱,但它更是一种对世俗生活的回望,只有回望了,那云彩才能闪烁出灵

光异彩。记得对我初期小说的评论,常可看到“清新”“明澈”的字眼,后来的小说,就常有人谈它的模糊性了。我想这是因为,我对小说的理解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我对人的存在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单一的或此或彼的,由于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太多的各种因素的神秘联结,它更应该是混沌的、复杂而微妙的,就如同一棵树、一个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一样,五脏六腑,样样俱全,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自给自足的世界。

当然,创造一个小说世界,并不比建造一个世俗世界更容易,因为小说世界虽说用的是世俗的材料,但它全来自一个主观的心脑,一不小心,心脑就可能武断地凌驾于小说的内在秩序之上,让小说世界听命于自个儿的指挥。相反,放任材料,无节制地铺陈,同样不是对小说世界的尊重,因为在混沌、复杂的同时,简单纯粹的作用也非同小可,就如同画龙点睛一样,这点睛的一笔,往往才是最有力量的。

于是,我便在小说的复杂、简单之间,在清澈、模糊之间,在安静、热烈之间,在微妙、宏伟之间,在持续、开始之间,在意识、潜意识之间,在行动、心理之间,在人与人、物与物之间,在思想与物质之间,在世俗性和神性之间,来来去去地行走着,就如同当年在那条坑洼不平的土路上的行走一样。

小说的思考,实在应该是一种路上的思考,一种犹豫不决的不确定的却又坚定地超越于思想和世俗的思考。

好在,我写作前的生存背景,可说是为这样的思考作了可靠的铺垫,或者说,这样的小说思考必然会呼应这样的生存。我需要做的,也许只是耐心、认真地走在那里,不确定什么,不追赶什么,永远地、勇敢地走啊走。是的,勇敢,我感到,犹豫不决也是需要一分勇敢的。

有些人,生来注定要播洒付出,奉献给予。应修人,他从“修人书箱”开始,办起通信图书馆,发起湖畔诗社,为朋友们出版诗集,进行秘密油印工作,最终为革命牺牲。他在钱庄这一行做得相当不错,所得却大多用于支持文学与革命,短短一生,所付远超所得。文学史上这一席之地,是他应得。

应修人,1900年2月7日出生于浙江慈溪县赭山应家河塘村,原名麟德,字修士。现宁波有修人学校。祖、父均为商店职员,应修人14岁高小毕业后即到上海福源钱庄做学徒。期满后留福源钱庄当账房,爱好写旧体诗。1920年至中国棉业银行任出纳股主任,开始发表新诗、童话及散文。1921年,创办上海通信图书馆。1922年,发起湖畔诗社。1925年,创办《支那二月》,参加共青团,随即转为中共党员。1926年奉命到广州黄埔军校担任任会计,次年“四一二”后转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宁汉合流”后到莫斯科学习。家人不允他远去,他假称送朋友登船而去。1930年8月回上海,加入“左联”,在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处地下油印科工作,周恩来、陈云等经常去他的住处。周恩来当时化名“伍豪”,在应修人家中完成了大量工作报告及指示文件。1932年,任中共江苏省宣传部长,编辑《大公报》。

1933年5月14日,丁玲和潘梓年被捕,丁玲的住处昆山花园7号已成诱饵。当天下午5时,“一位身材高大,穿着灰色长衫且戴眼镜的男子一人,自外步入”,正是时任宣传部长的应修人上门找左联党团书记丁玲,一进门即遭逮捕,他拒捕,在搏斗过程中从四楼坠下身亡。周扬当天也要去找丁玲,他比应修人稍晚一步,到昆山花园楼下时发现四楼玻璃窗内人影乱晃,情形不对,当即假若若无其事,向对面弄堂走去,幸免被捕。他所察觉到的情形,应该就是应修人拒捕扭打那一刻。

宁波人擅长做钱庄,应修人在这一行当也做得不错,但他从小有“归农”的想法,从他的日记里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有关综合农业的规划设想。百年前的中国当然不具备发展生态农庄的条件,泥饭碗不但难捧,而且所需也不少,无人支持的田园计划最终没有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田园与诗书总是连在一起的,应修人即将热情转向诗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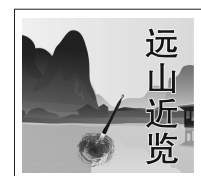
宁波素有藏书传统,应修人亦嗜书。1919年4月,他创办“修人书箱”,供友人借阅。4个月后改名“共书社”,更多人参与其中。后来又发展成上海通信图书馆,不少新文学作家都是这家图书馆的受惠者。该馆可以通信借书,“使得无产者有得书看”。出版有《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随书籍增加编印多期《上海通信图书馆书目》。该馆对外完全免费,内部另有“上海通信图书馆共进会”,会员需缴纳会费以为购书及经费。会员最多时有200余人,恽代英、杨贤江、郭沫若、郑振铎、钱俊瑞、叶圣陶、郁达夫、楼适夷、汪静之、李俨、魏金枝等人都是会员。1925年,通信图书馆内设立了共青团支部,应修人等人也在这里入党,由商务印书馆的共产党组织领导。

在文学史上,应修人最大的贡献当然是发起了湖畔诗社。汪静之曾言,没有应修人,就不会有湖畔诗社。1921年,应修人读到汪静之的诗,深为吸引。1922年1月,开始与汪静之通信。1922年3月,特意前往杭州见汪静之。两人一见如故,曹佩声戏称他们是“新结婚”。相聚一周,汪静之为此写了《情侣》《送你走后》《送你走后》原名《送修走后》。来到杭州不免泛舟,一船可坐四人,汪静之又叫上潘漠华、冯雪峰,结成湖畔诗社。4月,应修人出资出版了《湖畔》,选编了这四人的诗作。1924年底,又出版《春的歌集》,也由应修人出资。1925年2月创刊的《支那二月》,署名湖畔诗社编,也可算是湖畔的同人文刊。

应修人前两任妻子均从父母之命而娶,第一任妻子“秀妹”不识字,应修人鼓励她自习。第二任妻子“寒妹”被他称为“父母的媳妇”,接到上海入学,不久离异。在莫斯科时,他遇到同到莫斯科学习的曾岗,结为夫妻。一起回上海后,他与曾岗及曾岗的母亲组成三口之家,掩护革命活动。

应修人的诗当然是最出名的,如《妹妹你是水》。他写革命童话,《金宝塔和银宝塔》就是其中知名度很高的一篇。他还在《红旗周报》上写过多篇政治鼓动文章。

除了湖畔诗社的那两本合集之外,他没有别的集子。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应修人、潘漠华选集》。1982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修人集》。



应修人：注定奉献

□郑绩



大白话

偶遇一位从厅局级岗位退休不久的朋友,问起心情,他颇多感慨,举了两个特别不爽的例子:一、外出往返再没有前呼后拥的接送了;二、偶有社会活动不得不去而天气又极恶劣,趁现在配了车的领导车正闲着,抽冷子借用一次,领导即颇微妙。这位朋友不是小肚鸡肠的人,在位时兢兢业业,作风正派,对人也颇关心,那些现在前呼后拥新领导的人不少就是他任内从普通干部提拔起来的。尽管他知道这里面并不存在个人恩典的问题,但人情冷暖到这种程度,他多少还是有点意外。

回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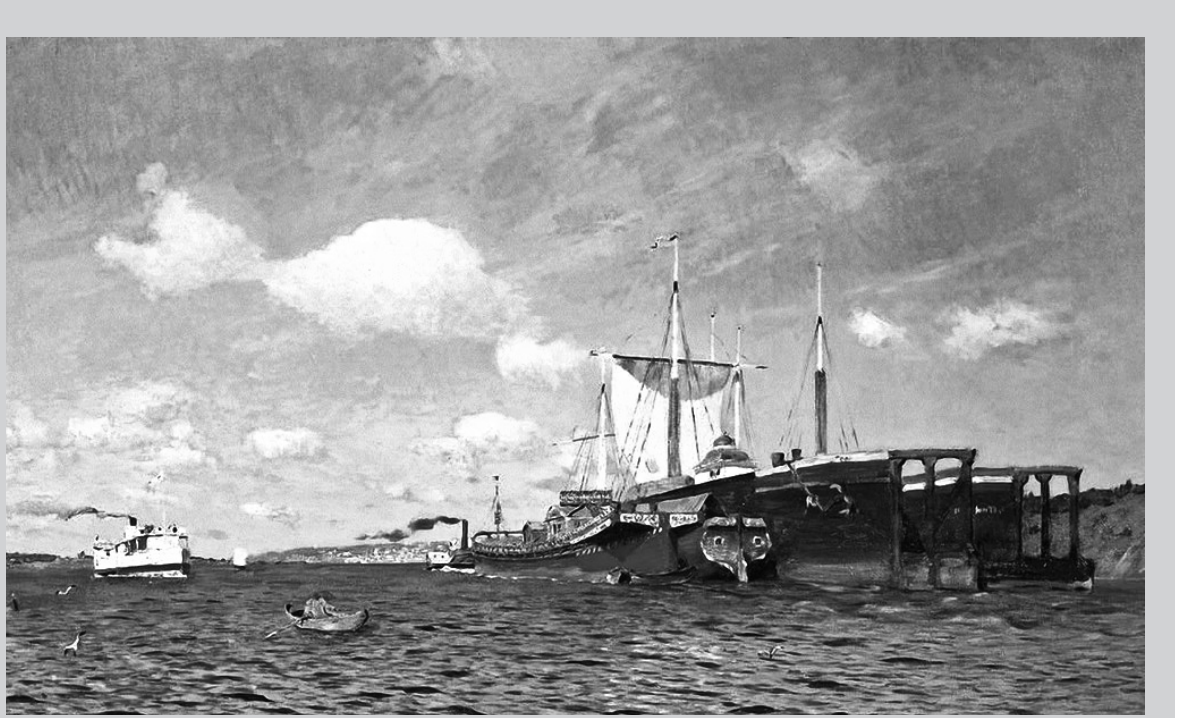
□陈世旭

我幸灾乐祸,笑道:你们党政官员是给权力养娇了,像我这样一介文人,又在一个边缘化的社团,爹不亲娘不疼的,反倒是一身轻松。当初没有你们的许多神气,如今也没有你们的许多怨气。这叫辩证法的胜利。并且给了两点建议:一、出门如果必须有人接送,最佳的选择是家人和好友;二、既无公务,当不再打公车的主意。办张公交卡备天气恶劣或去远处时用,多数时候最好迈开尊腿步行。“社会活动”属公益性的大可不必摆谱,属自我膨胀、自娱自乐的不去也罢。

讲究回报,是中国最受重视的文化传统之一。古往今来,报恩的动人故事浩如烟海;报恩的纪念物比比皆是,到处的名山大川往往少不了“报恩寺”、“报国寺”,不以“报恩”命名的寺庙也必有“报恩堂”之类;关于“报恩”的成语俗语不胜枚举:千恩万谢;感恩戴德;恩重如山;恩深义重;大恩大德,将何补报;再造之恩,恨无所报;结草衔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吃水不忘挖井人;鸦能反哺,羊知跪乳;养儿防老;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也有因为人家没有报恩而伤了心的:白眼狼、忘恩负义、过河拆桥、人情张张薄如纸……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中,佛家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儒家讲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让人隐约听见后面的切齿声。只有道家尊奉的祖师爷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翻成大白话可以理解为做了好事不求回报。

毫无疑问,知恩图报是一种美德,是君子的行为。但是对于施恩的一方面,我觉得还是老子的话比较有用。这并不是说,图回报就有多么糟糕。善待他人不图回报,认为图回报“善”就会变质,那也未必。图回报是人之常情,是一种潜意识,有好处,做好事,每个人心里都指望会有好的回报。你施人以笑,别人也答之以笑,你心里肯定舒服。倘别人报以冷面,甚至唾骂,你心里肯定忐忑。强求所有人都回报,做到受恩于人永志不忘,有恩于人记心上,既不近人情,也不现实,反而有可能造就一大堆伪君子。但是,太注重回报,就难免遇到失落的尴尬。更为严重的是,一个人倘若过分要求回报,还可能有风险。有一句谚语把人性说得相当黑暗:有时候最憎恨你的那个人,往往就是曾经受过你最多好处的人。因此我们恐怕要多地懂一点慈道。明代著名廉臣杨继盛临终前给儿子这样的遗嘱:“宁让人勿使人让我,宁容人勿使人容我,宁吃人亏勿使人吃我亏,宁受人气勿使人受我气。人有恩于我则终身不忘,人有恶于我则即时丢去……有人向你求人感你之恩,则云:‘他有恩于我,我无恩于人’……”唠唠叨叨其实只讲了一个字:“恕”。这既是箴言,也是一位老人对人生的彻悟。

内心不为名利所动,不为外物所役使,当然是超然脱俗了。但我们凡人很难做到。我们所能做的是尽可能保持内心的平静,尽可能接近脱俗。既已善待他人,那就不妨明白,不求于人回报也是一种“善待”,因而心安理得。这样,首先获益的其实是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有没有回报也就无所谓了。



伏尔加河上的清风(油画) 【俄】列维坦 作



星河 璩

写散文和读散文,在当下的时代环境中,同样都具有向传统致敬的意味。

这首先是因为散文这种体裁不仅出身古老、源远流长,而且长期备受社会推崇。其次,也因为散文早已不止是一种文学体裁,更代表着一种历史悠久、覆盖宽广的社会心理习惯。

从上古先秦到明清以至近代,与今天我们所称的“散文”大致相当的“文”,一直被当作一类能够记述历史、政治、学术、思想和艺术等各方面重要知识信息的尊贵文体。隋唐至清末,科举制度实行的近1300年里,“诗”、“文”的写作,更因直接关联着科举取士的考试科目,而成为历代读书人热衷修炼的安身立命之道和出人头地之术。

伴随常年的“诗”、“文”诵读和书写,一辈辈读书人成长起来,臻于人情和学问的练达,然后走向终老。岁月推移,千百年历练,“诗魂”和“文心”在无数中国读书人的精神世界里,积淀为不朽。“诗”、“文”的表达方式,也逐渐内化成了“诗”、“文”的作者群和读者群共有的一种心理习惯,影响到他们把握自我、理解世界和应对社会的思想意识和言行做派。每当“达则兼济天下”的时刻或氛围来临,则“诗”、“文”昂扬奋发于“载道”。每当“穷则独善其身”的情境切近,则“诗”、“文”低回盘桓于“言志”。

穿越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文言形态的“诗”、“文”,从文学正宗的宝座上仓皇退位,现代白话形态的小说、诗歌、散文和话剧竞相兴起,以决裂于旧文学和开放于域外文学的声势,拓展出一片新文坛。但实际上,即使在新文坛闯将的笔墨辞章里,旧文学依然形迹未灭、魂魄不散。“诗魂”和“文心”,“言志”和“载道”,在游荡和沉浮之际,在文言和白话之

间,时时显露着古今如一的印痕。而这一点在散文中的体现,又远比在小说、诗歌和戏剧中更为鲜明。

有意或无意,偶然或必然,从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高调——“个人的发现”开始起步的现代散文,一路走来,行踪所向,却依然归于保守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泥古、恋旧。这当然不是单纯的语篇修辞或作品面貌的问题,而是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体并行的文学现代化进程

中,越往前走,就越发主动推卸庄重的精神承担、放弃严肃的文化使命的一个典型症候。

鲁迅、郁达夫、朱自清等新文学的开拓者,都曾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不约而同地肯定过现代文学初兴之际的散文,称赞他曾与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先进社会思潮密切结合、表里相应,为“个人”的“发现”,尽到了其他文学体裁所不能替代的历史责任。但在这之后,从社会文化地平线上崛起的“个人”,挺进到更复杂的际遇中,又是如何持续坚守、不断应变和发生变异的,这一意义更丰富、细节更生动的过程,却大有干净、彻底地退出散文的取材领域,向小说、诗歌和戏剧甚至非文学性质的历史、新闻等其他写作体裁全面转移之势。

借鲁迅的说法,一度远在小说、戏曲之上的散文,就此移形换位,朝着文学和社会双重意义上的“小摆设”的方向,轻飘飘地飞奔起来。依眼前即时可行的某种读或写的趣味而言,这样的散文姿态,或许也有它的一点特殊价值。但纵目宏阔深广的文学、社会和人类精神生活的多重历史背景,散文如果仅限于此,那就实在是有负于传统,更有负于时代。

潘恂这层事实并且致力于矫正和改变借用鲁迅的说法,一度远在小说、戏曲之上的散文,就此移形换位,朝着文学和社会双重意义上的“小摆设”的方向,轻飘飘地飞奔起来。依眼前即时可行的某种读或写的趣味而言,这样的散文姿态,或许也有它的一点特殊价值。但纵目宏阔深广的文学、社会和人类精神生活的多重历史背景,散文如果仅限于此,那就实在是有负于传统,更有负于时代。

潘恂这层事实并且致力于矫正和改变借用鲁迅的说法,一度远在小说、戏曲之上的散文,就此移形换位,朝着文学和社会双重意义上的“小摆设”的方向,轻飘飘地飞奔起来。依眼前即时可行的某种读或写的趣味而言,这样的散文姿态,或许也有它的一点特殊价值。但纵目宏阔深广的文学、社会和人类精神生活的多重历史背景,散文如果仅限于此,那就实在是有负于传统,更有负于时代。

潘恂这层事实并且致力于矫正和改变借用鲁迅的说法,一度远在小说、戏曲之上的散文,就此移形换位,朝着文学和社会双重意义上的“小摆设”的方向,轻飘飘地飞奔起来。依眼前即时可行的某种读或写的趣味而言,这样的散文姿态,或许也有它的一点特殊价值。但纵目宏阔深广的文学、社会和人类精神生活的多重历史背景,散文如果仅限于此,那就实在是有负于传统,更有负于时代。

潘恂这层事实并且致力于矫正和改变借用鲁迅的说法,一度远在小说、戏曲之上的散文,就此移形换位,朝着文学和社会双重意义上的“小摆设”的方向,轻飘飘地飞奔起来。依眼前即时可行的某种读或写的趣味而言,这样的散文姿态,或许也有它的一点特殊价值。但纵目宏阔深广的文学、社会和人类精神生活的多重历史背景,散文如果仅限于此,那就实在是有负于传统,更有负于时代。

潘恂这层事实并且致力于矫正和改变借用鲁迅的说法,一度远在小说、戏曲之上的散文,就此移形换位,朝着文学和社会双重意义上的“小摆设”的方向,轻飘飘地飞奔起来。依眼前即时可行的某种读或写的趣味而言,这样的散文姿态,或许也有它的一点特殊价值。但纵目宏阔深广的文学、社会和人类精神生活的多重历史背景,散文如果仅限于此,那就实在是有负于传统,更有负于时代。

潘恂这层事实并且致力于矫正和改变借用鲁迅的说法,一度远在小说、戏曲之上的散文,就此移形换位,朝着文学和社会双重意义上的“小摆设”的方向,轻飘飘地飞奔起来。依眼前即时可行的某种读或写的趣味而言,这样的散文姿态,或许也有它的一点特殊价值。但纵目宏阔深广的文学、社会和人类精神生活的多重历史背景,散文如果仅限于此,那就实在是有负于传统,更有负于时代。

句细读原作的基础上,力求质朴、晓畅地写出来的。

20多年前,“新散文”引起文坛关注之初,不少评论家和新散文作家本人,都曾以对传统的叛逆、反抗、冲击、突破等说法,来形容“新散文”创作的品性和追求。这几乎是历史上所有有出息、有作为的艺术家、文学家,在大踏步前进时,都必然会亮出的一种自我激励和制造声势的话语旗帜。它凝聚、象征了那种永远可贵的创新意志和奋斗气概。

但也正如历史上反复再现过的一幕又一幕,人们常常把这种象征化和符号化的话语旗帜,直接等同为事实,进而对真正存在的事实形成误判和曲解。今天看起来,在抨击传统和反叛传统的旗帜下,“新散文”累积20多年的创作实绩,正与它理念旗帜上的口号截然相反。对我们民族古老的散文传统和与此相依相傍的精神生活传统,它们根本没有绝情地背离和遗弃,而是做了最忠诚、最执著也最多样化的继承和发扬。

按照语言特点和艺术风格等一般的文学欣赏尺度衡量,“新散文”旗下的作家作品完全可谓神态各异。但在把散文和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体验深切、细腻、紧密地实行结合,以至利用散文写作来推进精神生活的深广度和厚重度这一点上,“新散文”作家却显现着独异的整体性和共同性。

这也正是感受、理解和评价“新散文”作品的一个关键切入点。站在这个切入点上,我们或迟或早总会发现:“新散文”所能给予我们的和我们需要“新散文”提供的,并不一定非得是文学表达形式上的全副崭新,更要紧的,是开辟在个人精神世界和现实社会之间的一条条崭新的心灵通道。